

# 山西票号综览

寫字第十萬四千四十六號

準二兩平足色

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戶部奏行官  
票凡願將官  
票兌換銀錢  
者與銀一律  
並准按部定  
章程照交官  
項偽造者依  
律治罪不貸

主 编 张巩德  
新华出版社

● 主 编 张 巩 德  
● 副主编 吴 荣 富 周 丽 萍

# 山西票号综览



● 新 华 出 版 社

# 京新登字 110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票号综览/张巩德主编.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6. 8  
ISBN 7-5011-3193-7

I. 山… II. 张… III. 商业经济-经济史-中国-山西 IV  
. 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0269 号

## 山西票号综览

主编 张巩德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11.5 字数:273 千字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

ISBN7—5011—3193—7/F·455 定价:16.80 元

# 序 言

范堆相 申维辰

晋商发迹于宋代,明朝时与徽商并峙,同为有势力的商帮。明朝文学家谢肇制在笔记《五杂俎》中这样记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这说明,山西由商而殷,明代已是全国最富的省份了。

到了清朝,晋商鳌头独占,不仅店铺遍设全国通都大邑,远涉日本、西亚和俄罗斯等地,经营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以道光初年“日升昌”票号的诞生为标志,完成了由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变。此后的近百年间,山西票号“执全国金融之牛耳”,“票号汇通天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晋商何以兴,何以盛,何以衰?它作为一种极重要的历史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山西票号综览》一书的编者,通过浩繁的挖掘整理,为人们研究晋商提供了一份综合资料,展示了晋商兴衰的轨迹。可谓正逢其时,难能可贵。

我们反思历史,研究前人,不是为研究而进行研究,而是为了借鉴历史,超越前人。我们之所以提出在“九五”期间把晋中建设成为全省的经济强区,除考虑到资源、区位等诸多有利条件外,更看重的是晋商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像晋商开疆拓土、争占市场的气概,变商业资本为金融资本的远见卓识,诚笃信义的商业道德,敏锐机变的经营策略,选贤荐能的用人之道,所有者与管理者分离的经营体制,就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也有很强的借鉴

意义。晋商文化优势是晋中所独有的,我们必须珍惜这个优势,从晋商文化中汲取更多的营养,并在实践中发扬光大。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比前人更为辉煌的业绩。

一九九六年五月

---

注:范堆相:中共晋中地委书记  
申维辰:晋中行政公署专员

# 目 录

|                    |            |
|--------------------|------------|
| 序 言 .....          | 范堆相 申维辰(1) |
| 第一编 山西票号发展概况 ..... | (1)        |
| 一、山西票号的产生经过 .....  | (1)        |
| 二、山西票号的初级阶段 .....  | (6)        |
| 三、山西票号的黄金时期 .....  | (16)       |
| 四、山西票号的衰落过程 .....  | (29)       |
| 五、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 .....  | (36)       |
| 第二编 四十三家票号简介 ..... | (54)       |
| 一、日升昌票号 .....      | (54)       |
| 二、蔚泰厚票号 .....      | (70)       |
| 三、蔚丰厚票号 .....      | (79)       |
| 四、蔚盛长票号 .....      | (87)       |
| 五、新泰厚票号 .....      | (90)       |
| 六、天成亨票号 .....      | (93)       |
| 七、日新中票号 .....      | (97)       |
| 八、协和信票号 .....      | (98)       |
| 九、协同庆票号 .....      | (99)       |

|                 |       |
|-----------------|-------|
| 十、百川通票号 .....   | (106) |
| 十一、乾盛亨票号 .....  | (108) |
| 十二、谦吉升票号 .....  | (111) |
| 十三、蔚长厚票号 .....  | (112) |
| 十四、其德昌票号 .....  | (116) |
| 十五、云丰泰票号 .....  | (117) |
| 十六、松盛长票号 .....  | (118) |
| 十七、祥和贞票号 .....  | (119) |
| 十八、义盛长票号 .....  | (119) |
| 十九、汇源涌票号 .....  | (120) |
| 二十、永泰庆票号 .....  | (120) |
| 二十一、永泰裕票号 ..... | (120) |
| 二十二、宝丰隆票号 ..... | (120) |
| 二十三、合盛元票号 ..... | (124) |
| 二十四、大德兴票号 ..... | (129) |
| 二十五、大德通票号 ..... | (129) |
| 二十六、元丰玖票号 ..... | (143) |
| 二十七、三晋源票号 ..... | (146) |
| 二十八、巨兴隆票号 ..... | (148) |
| 二十九、存义公票号 ..... | (148) |
| 三十、兴泰魁票号 .....  | (149) |
| 三十一、长盛川票号 ..... | (150) |
| 三十二、大德恒票号 ..... | (150) |
| 三十三、大盛川票号 ..... | (160) |
| 三十四、大德源票号 ..... | (162) |
| 三十五、志成信票号 ..... | (162) |
| 三十六、协成乾票号 ..... | (172) |

---

|                           |              |
|---------------------------|--------------|
| 三十七、世义信票号 .....           | (175)        |
| 三十八、锦生润票号 .....           | (176)        |
| 三十九、大德川票号 .....           | (180)        |
| 四十、三和源票号 .....            | (182)        |
| 四十一、大德玉票号 .....           | (182)        |
| 四十二、义成谦票号 .....           | (184)        |
| 四十三、巨兴源票号 .....           | (185)        |
| <b>第三编 山西票号十大财东 .....</b> | <b>(186)</b> |
| 一、祁县乔家 .....              | (186)        |
| 二、祁县渠家 .....              | (214)        |
| 三、平遥李家 .....              | (223)        |
| 四、介休侯家 .....              | (232)        |
| 五、介休冀家 .....              | (240)        |
| 六、榆次常家 .....              | (249)        |
| 七、榆次王家 .....              | (265)        |
| 八、平遥毛家 .....              | (280)        |
| 九、太谷负家 .....              | (288)        |
| 十、太谷曹家 .....              | (291)        |
| <b>第四编 山西票号大事记 .....</b>  | <b>(309)</b> |
| <b>附 资料来源 .....</b>       | <b>(352)</b> |
| <b>后 记 .....</b>          | <b>(361)</b> |



## 第一编 山西票号发展概况

山西票号,产生于道光初年,以后经历了初级阶段、黄金时期和衰败末落三个阶段,先后共 100 多年,在这 100 多年的经营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到的经营管理策略。由于山西票号经营有方,因而给山西人创造了亿万两白银的收入,使山西成为当时全国的首富。山西票号是被人们称为“汇通天下”的金融组织。山西票号的经验值得总结,他们的经验不仅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且对我们今天发展市场经济仍有借鉴作用。

### 一、山西票号的产生经过

票号,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票号,是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另一种主要组成部分。它源于汇兑,为不同地区间资金调拨服务,起着促进商品流通的作用。汇兑业务原是适应埠际贸易的开展,解决不同地区间由于长途贩运而形成的债务清算和资金平衡等一系列问题而产生的。原先调剂地区间金融流通的业务常常是某些财力较强的商店的兼营业务。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和在更大范围内开展贸易活动,客观上也就对当时某些兼营汇兑业务的商店提出汇兑专业化的要求。这样,以汇兑为业务的票号便从商业中逐渐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金融组织。

在票号产生之前,我国北方已经有一种与商业发生借贷关系的金融组织,称为帐局。这种组织对票号的产生间接地起过一定的作用。因此,在叙述票号产生之前,有必要对帐局作一简介。

帐局,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商业城市。据史料记载,帐局产生于清乾隆之前,在当时,经营帐局的,基本上都是山西商人。所以,有的同志认为,帐局的产生,与山西商业从事中俄贸易活动有关。

1729年(雍正七年),清政府在中俄边界的恰克图设立市集,到乾隆时,恰克图便成为中俄两国通商的主要商口,而中国内地的商人到恰克图参加贸易的大多是山西人。他们从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到恰克图易换各种皮毛。而交换中,中国主要是出口茶叶,但国内茶叶主要产自福建、安徽、浙江、湖南、湖北等省。这些茶叶,主要是由山西商人经营,由南方各省转运销往关外,与俄国商人成交。山西商人从南方各省贩运茶叶,流转周期很长,每流转一次,大约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这样,山西商人便需要社会信贷的融通,才能完成长途运贩。因此,山西商人便设立了帐局,承担信贷融通的任务。山西商人在设立帐局的同时,也在外地设立了分号。帐局以对工商业者开展存放资金为主,同时有的帐局还兼营对候选官吏发放贷款。不过,早期帐局,只从事信贷,而不办理汇兑。后来,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在客观上迫切需要解决不同地区间收解现金和清算债务的实际问题。从前,现金收解往往依靠商人自己运现,或由镖局押运的方法解决。但是,由于商业日益兴旺,这种解运现金的方式,很不适应商品流通区域日益扩大这一客观需要。于是,一些信誉好的商铺利用它们设有分号的关系,逐渐把不同地区间的汇兑,作为兼营的业务。因此,到了嘉庆年间,这种兼营汇兑的商号,已经出现了。由于经营汇兑业务,汇水收入十分优厚,不久,票号便产生了。

票号为什么会产生,我们从日升昌票号产生的原因中可以知道。西裕成颜料铺为什么要改组为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是为了适应当时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清朝乾隆之后,随着国内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山西人外出经商和

谋生的人多了,迫切需要有一个为他们传递家信和捎寄贍家银钱的组织。因此,有人创设了信局,通行各省。信局的开设,改变了我国封建社会民间不通书信的局面。同时也为票号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即商铺寄送汇票,票号寄送信件都有了可能。同时,又由于清政府日益腐败,鸦片开始大量输入,白银外流,银钱比价波动,钱铺接连倒闭,人民深遭苦难。对内捐税激增,民不聊生,加以自然灾害袭击,农民起义频繁,民间抢劫亦多。当时,官民外出都有戒心。这种情况说明,起标运送现银的方式已经很不安全,商人及官吏都迫切需要以汇兑代替运现。

关于票号,究竟起源于何时,史书中说法很多。有的人说票号起源于隋末唐初。有一个名叫叶德景的人,1905年写了一本书,因在山西灵石曾发现罗马的钱币,说罗马人在山西买铁,山西商人游行远近各地,招揽生意,成为金融业者。有人说,自公元900年(唐昭宗光化三年),就已经有人经营这种事业,或把唐宪宗时的飞钱和票号连在一起。有人说是明朝中叶产生的,在清初,因战争摧残,消灭殆尽。上海《银行周报》第七号、第八号有东海《山西票号》一文,说明明朝中叶兴起,当时成立未久,势力尚薄弱,营业区域仅限于北京等少数地方。李自成失败后基本消亡。日本大正四年的《支那》杂志第六、第七两号载有《山西票庄》一文,也有同样的说法。有人说,因李自成败走时,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山西太原康家的院子里,康家拾得800万两白银,就用来创设票号。日本明治40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出版的《支那经济全书》(中译本《中国经济全书》,宣统二年出版)第三辑、第五辑《山西票庄》也持此说。这大概是中国的一种传说。甚至有人说票号中的规则是顾炎武所订的。徐珂《清稗类钞》中说: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为顾炎武所订,遵行不废,称雄于商界者200余年。袭用此说的人最多。这恐怕不一定

正确,只是一种传说。另外,有人说票号创始于康熙、乾隆时代。这几种说法,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清初的史书中偶尔提到西客,有人说西客就是山西票号的别名。实际上西客只是说山西客商。不能说就是山西票号。而且明末的汇兑业务,还是由政府办理,这也证明当时没有票号。

关于山西票号的起源,比较可靠的是发源于西裕成颜料铺的说法。据说,在乾隆嘉庆年间,有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在北京开设西裕成颜料铺。当时,现银的运送,数目多的由镖局保送,但有时仍然有被劫的事,雷履泰于是创办汇兑的办法,后来,将颜料铺改为票号。至于汇兑的办法,并不是雷履泰所创办的。唐朝的飞钱,宋朝的便换不必说,明清都有会票的办法,雷履泰不过加以仿效罢了。那么,日升昌票号出现的具体时间,对于这个问题有三种说法:一说 1821 年(道光元年)《山西金融志》说本年由号东出资 30 万两,雷履泰出资 2 万两,颜料庄正式改为票号。二说 1824 年。《山西文史资料》第十辑:东伙共同商定另设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时在 1824 年(道光四年)。三说是道光年间或道光十一年。《太谷历史文献辑录》:据说该庄平遥总号经理说是道光年间,北京的经理则说是道光十一年。据日升昌票号万金帐记载,头一帐是 1829 年(道光九年)立的,头一帐以六年为一期,向前推六年,应是 1823 年(道光三年)成立的。所以,山西票号产生的年代,应以 1823 年比较准确。

票号产生后,在组织和经营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它在组织上,有独资经营,也有合资经营,但均负无限责任。票号在创立时,由出资人和经理出面,邀请证人三至五人,书立合同,规定资本若干两,以若干两作为一股,几年合算大帐一次,盈亏按股均分。经理顶人力股,另立万金账,用以笼络店伙,由经理视职员劳动情况,酌定其顶人力股的多寡。所以人力股有时会超过资本总数。东家平

时不问票号的具体业务,一切由经理经营。票号资本都存贮于总号,设分号时,不另发资本,只给办事人一定数额的路费和开办费。例如,甲分号开设后,营业需款时,自有相联系的乙、丙分号源源接济。总号对分号的关系是全局统筹,而联络的原则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快。

票号产生的最初阶段,经营者几乎全是山西商人,特别是以平遥、祁县、太谷三县的商人为主。所以,在商业界有称之为山西票号的“三帮”。道光初年,山西票号产生,首先是由平遥商人雷履泰创设日升昌票号,汇兑业务兴旺,收入较多。日升昌票号创立不久,同县的蔚泰厚绸布庄、蔚丰厚绸缎庄、蔚盛长绸缎庄、新泰厚绸缎庄、天成亨布庄,也都先后由商店改变为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票号业中习惯称这五家票号为“平遥蔚字五联号”。与此同时,在太谷县,祁县也创办了票号。它们以资力大小不同,在若干商业城市设立分号。并且在互相调剂金融的情况下,构成了一个以汇兑为主、以存放款为辅的金融体系。它们的业务活动对商品流通区域扩大上所起的积极作用,迅速地为社会所认识。到道光六七年后,各地的汇兑活动,已经非常活跃。因而,票号的产生,给不同地区间因商业关系引起的远距离的金融调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时,北方商路上一直进行活动的帐局,仍旧把自己的业务范围限制在华北各省的商业城市之间,并且固守存放款业务,而不经营汇兑。这样,票号就把埠际贸易服务的汇兑业务完全承担起来了。票号通过频繁的汇兑活动,增大了自己的力量。同时,在经营汇兑的活动中,为了适应社会的要求,逐步地开展了存放款的信贷业务,这样就使票号发展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金融组织。

票号发展初期,清政府对票号采取了扶植政策,只收少数的营业税。所以,票号很快得到了发展。在 19 世纪 20 年代末,就已经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山西平遥、西安、重庆、开封、苏州等商业城

市为日见发达的商业交往,起着调剂金融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对中国旧有的经济结构产生冲击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刺激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以调剂社会金融为主要业务的票号,自然在社会经济变化中相应地为自己开拓了发展的途径。

## 二、山西票号的初级阶段

日升昌票号于1823年(道光三年)成立后,随后在平遥、祁县、太谷又有多家票号成立,到1860年票号发展为14家,它们是平遥的日升昌、蔚泰厚、蔚丰厚、天成亨、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协和信、协同庆、百川通;祁县的合盛元、大德兴、元丰玖;太谷的协成乾。这些票号的总号都是创设在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并在全国各地很快活跃。1850年(道光三十年),日升昌、蔚泰厚和日新中三家票号,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号已达35处:分布于北京、天津、沈阳、张家口、济南、南京、苏州、扬州、清江浦、芜湖、屯溪、汉口、沙市、重庆、成都、长沙、广州、常德、周家口、开封、河口、西安、三原等23个城市。这些票号广设分号,而且频繁活动,给全国各地商业交往和资金流转,带来了空前未有的便利。山西票号初级阶段经营业务主要是汇兑,同时也开展了存放款业务。

### 1. 汇兑业务

山西票号,前期的主要业务是承办国内商业汇兑。在当时交通不便、道路险阻、行旅为艰、运送现银苦费周折的情况下,山西票号办理银两汇兑,对促进商业的繁荣,加速资金的周转,起了积极的作用。

汇兑的方式分票汇、信汇和电汇三种形式:

(1)票汇。这种方式就是汇款人将款交给票号,由票号开汇票一张,交给汇款人,汇款人将汇票寄给收款人,收款人持票向票号取款,不用讨保,谓之“认票不认人”。普通汇款以此种方式最多。

(2)信汇。这种方式就是汇款人交款给票号后,写信给收款人。票号收到汇款,就写信通知汇款地的分号或连号。收款人接到汇款的信,持信向交款地的票号中取款,票号如接到交款的通知,即行付款。此种办法有半信用汇款在内,故非素有往来的大商号,则不用信汇。

(3)电汇。后来,国内邮政和电讯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各地普设电报局,山西票号又开展了电汇业务。凡遇有紧急需款,即可交由票号电汇。票号拍发电报,有自编之密码,其日期、平色、数目,均能以二字代替,颇为简捷。唯有汇费较昂贵。

票号汇兑一般是顺汇(即甲地先收款,乙地后付款)。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需要,又采取了放款与汇兑相结合的办法,开展了逆汇。所谓逆汇,就是甲地票号通知乙地票号先付款,随后甲地票号再向汇款商铺收款。先付后收间隔的时间,以月息计收利息。

汇费没有固定的额数,由顾客与票号面商而定。汇费(也叫汇水)的大小,往往因人而异,看与票号的关系如何。平常计算汇费,则以两地平色的高下,期口的淡旺,月息的大小,路途的远近,银根的松紧等为估定的标准。普通时候,在交通便利的通都大邑,每1,000两仅需二三两的汇水,若是交通不变的地方,每1,000两的汇水达二三十两,有时或高至七八十两。新疆每1,000两,汇水多达100两。

电汇汇水,大宗每100两需一二两。电汇较票汇、信汇汇水大,一则因电汇见电就能支款;二则票号中间不能运用汇款生息,所以汇水就大。

不过,在山西票号的初期,票号的汇兑业务,主要还是调剂北

方商业城市的金融。对于这个问题,史料中曾有过多次的记载,如介休侯家所创设的蔚泰厚票号苏州分号,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和日升昌票号出资创设的日新中票号北京分号,1850年(道光三十年)所遗留的帐目,都反映了这个现象。这两家票号各在当年全年收汇银 81.9253 万两,分别汇往 14 个城市,其中:汇往平遥 12.1249 万两,占 14.8%;京都 11.6334 万两,占 14.2%;张家口 10.9846 万两,占 12.8%;三原有 3.9324 万两,占 4.8%;苏州 14.255 万两,占 17.4%;汉口 9.4214 万两,占 11.5%;芜湖 4.0143 万两,占 4.9%;河口 7.3732 万两,占 7.9%。其余奉天、西安、济南、常德、沙市、南京等城市合计,不过占 11.8%。这个统计清楚地反映了北方各省商业城市在票号的收汇款业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仅平遥、京都、张家口三地合计便占了汇款总数的 41.8%。同期中,这两家票号全年交汇金额为 73.9913 万两,分别由 13 个城市汇来,其中:平遥 14.8722 万两,占 20.1%;京都 17.7579 万两,占 24%;张家口 5.0314 万两,占 6.8%;三原 7.1031 万两,占 9.6%;汉口 6.7332 万两,占 9.1%;常德 3.9215 万两,占 5.3%;其余苏州、河口、西安、芜湖、南京、屯溪、济南等城市合计占 24.6%。其情况同样表明北方各省商业城市在当时票号的汇兑业务中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据日升昌票号清江浦分号(1852 年)、日新中票号京都分号(1852 年)、日升昌票号江西河口分号(1853 年)、日升昌票号苏州分号(1856 年)和蔚泰厚票号沈阳分号(1858 年)汇兑金额统计,它们在一年中收汇 168.1377 万两,汇往 19 个城市,其中,平遥占 27%,京都占 20%,两地合计占 47%,几近半数。其他 17 个城市才占 53%。同期中,这 5 家分号,全年交汇金额为 167.9665 万两,汇来城市涉及 20 处,其中平遥占 12%,京都占 12%,天津占 7%,三地占 31%。上述统计,由于分号所在地区不同,汇兑年限也不一致,当然不能作为票号汇兑全面情况的反映,



但是,在有关票号原始资料非常缺乏的情况下,这两项统计也能说明票号早期的活动地区侧重在我国的北方这个倾向。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提出来,那就是在这一时期,票号的业务主要是商业汇兑。我们还以日升昌票号的河口分号为例分析。这个分号 1853 年(咸丰三年),收汇款项为 18.1043 万两,其中汇交商号的为 13.4518 万两,占收汇总额的 74.3%,汇交清政府官员的仅为 3,713 两,占总数的 2.1%。同年,交汇的款项为 17.4577 万两,来自商号交汇的为 14.2598 万两,占交汇总额的 81.68%,官吏交汇的仅 1,135 两,占总数的 0.65%。可见,在 19 世纪 50 年代票号业务的特点主要是为日趋发展的埠际贸易服务的。这一点是票号创设的初衷,也是票号创立初期的实际情况。

票号在经营汇兑的具体活动中,还往往会出现与存、放款相结合的情况。这就是说,票号在开展汇兑业务过程中,经常遇到商号要求先为它垫付汇款,议定在一定时间后再收回所垫款项,而商号在交还垫款的同时,还要交付一定数量的利息。这样做的结果就进行了票号的放款。还有一种情况,票号在收下商号交汇的款后,议定延迟一定的日期(不包括必要的汇兑),向受款者交付汇款,票号免收汇费,如果时间长了,还给予一定的补贴。这种汇款实际上也无异乎票号的存款。这种存、放和汇兑相结合的情况,在票号的业务经营中,通称为“逆汇”。这种“逆汇”的业务在 1844 年以前就已经存在。如蔚泰厚票号苏州分号,在 1844 年的信件中称:“有玉盛号于三月二十一日会(汇)借去咱足银 3,200 两,连空伊朝一月,均按 9 厘,立七月初十,在京无利交咱头白银……”。这则材料表明,苏州玉盛号请蔚泰厚票号苏州分号代其向北京汇去 3,200 两白银,但未交款,由蔚泰厚票号苏州分号代垫,然后在北京由该票号收回垫款本息。这实际上是从逆汇关系上体现票号放款的事实。又如日升昌票号张家口分号 1850 年(道光三十年)正月初十的信